

读书·治学与做人丛书

学问人生

学问人生 [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 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学问人生

学问人生 [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 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旨在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 30 周年,展现该院专家学者的治学经验、思维智慧和学术贡献,给广大中青年学者治学、做人树立榜样,提供启迪。

本书收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包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时期)91 位著名学者的文章以及部分缅怀已逝著名学者的文章共 100 篇。这些著名学者大多是各自专业领域的学术奠基人,同时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他们的研究几乎涉及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这些文章全面记述了他们的生平、学术业绩和治学经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问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下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编.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04-022167-1

I. 学… II. 中… III.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生平事迹-文集 IV. K82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0882 号

策划编辑 张 华 肖彤岭

责任编辑 姜兰志

封面设计 张 朋

版式设计 宋新士

责任校对 王 超

责任印制 韩 刚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58582141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网 址 <http://www.hepsd.cn>

邮政编码 100011

<http://www.hep.com.cn>

总 机 010-58581000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本册印张 27.5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总 印 张 54.5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本册字数 480 000

总 定 价 79.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22167-001

謹以此書獻給

中國社會科學院建院

三十周年紀念

中國社會科學院老專家協會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丁伟志 丁磐石 郭永才

副主编 刘培育 陈启能 李惠国

编 者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伟志 丁磐石 刘培育 李惠国

吴元迈 谷源洋 陈启能 张椿年

杲文川 周明俊 胡广翔 郭永才

章丽君 董谊思

目 录

张政烺		
真诚求实是为人为学之本	张永山	2
王 森		
藏学家王森先生	刘培育	13
熊德基		
平凡中见精神	刘 驰/熊志勇	21
贾 芝		
我是草根学者	贾 芝	29
吴晓铃		
我研究戏曲的方法	吴晓铃	38
顾 准		
顾准的学术生涯和感情世界	赵人伟	46
刘大年		
矢志不渝的真理追求者	刘 潞	56
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奋斗一生	张海鹏	66
于光远		
独立思考，天天向上	胡冀燕	78
吴承明		
博学勤思通古今	果文川	88
学习和治学的一些体会	吴承明	94
汪敬虞		
黄门忆往	汪敬虞	100
胡 绳		
解放思想的表率	丁伟志	110

胡庆钧		
八上凉山研究奴隶制的胡庆钧	杲文川	123
马 洪		
将经济学原理运用于中国建设实际的开拓者	吴家骏	130
蒋一苇		
开拓创新 锐意改革	陈佳贵	142
周礼全		
周礼全先生的为学与为人	刘培育	150
安志敏		
尊师重道 考古一生	安家瑶	162
董乐山		
值得细细品读的人和书	李 辉	170
王仲殊		
关于中日交流考古学的研究	王仲殊	175
高 莽		
艰苦的道路	高 莽	183
徐 葵		
走上研究苏联之路	徐 葵	191
蒋和森		
蒋和森先生谈治学	崔德建	204
李 琮		
学术生涯的片断回忆	李 琮	210
蔡美彪		
读书立志, 攀登高峰	蔡美彪	217
曹道衡		
厚积薄发, 研几抉微, 在平实中创新	刘跃进	221
周叔莲		
治学拾零	周叔莲	230
陈乐民		
论学五题	陈乐民	239
资中筠		
翻译两谈	资中筠	245

丁伟志		
学、问、思、辨、行“五字经”	丁伟志	252
梁存秀		
在研究德国哲学的道路上	梁存秀	260
汝 信		
从参观一所大学想到学风问题	汝 信	274
林甘泉		
林甘泉先生的史学灼见	卜宪群	281
仇士华		
碳十四年代测定回顾	仇士华	288
钱中文		
探索与感悟	钱中文	297
邓绍基		
我对元代文学的探索	邓绍基	304
张卓元		
锁定目标 笔耕不辍	张卓元	314
陆学艺		
做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面向实践，到实践中去	陆学艺	322
张 炯		
我的读书与生活道路	张 炯	335
柳鸣九		
我劳作故我在	柳鸣九	342
叶秀山		
30 年学术工作感想	叶秀山	350
廖学盛		
沿着历史和逻辑统一的道路探索	廖学盛	356
陈高华		
研究领域广阔的史学家	刘 晓	361
吕同六		
忆同六的学术之路	蔡 蓉	368
追求美德与知识	吕同六	379

方克立

与博士生一夕谈	方克立	382
---------------	-----	-----

史金波

学海无涯	史金波	393
------------	-----	-----

黄长著

我对治学问题的一点体会	黄长著	409
-------------------	-----	-----

黄宝生

跋涉在梵学之路	黄宝生	419
---------------	-----	-----

郑成思

为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鞠躬尽瘁	陈 甦	424
-----------------------	-----	-----

读书、学习与研究	郑成思	429
----------------	-----	-----



张政烺

■ 简 历

张政烺（1912—2005），字苑峰，山东荣成人。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同年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46年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1954年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1960年又调任中华书局副总编，1966年专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受聘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顾问。1983年受聘为文化部中国文物委员会委员，又是中国考古学会终身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

■ 主要论著

《张政烺文史论集》。

真诚求实是为人为学之本

——我认识的张政烺先生

◆ 张永山

张政烺先生在 60 余年科研教学的经历中，取得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这与他不断地总结为人、治学的经验分不开。他书写的篆书座右铭条幅警句云：真诚求实是为人为学之本。这既是他为人治学经验的概括，也是他勉励后学的至理名言。

一、买书与读书

在《我在史语所十年》一文中，先生强调他在史语所图书馆工作时，要完成傅斯年所长规定的图书采购任务，而这个任务的难度是很大的。因为所长“规定买书不能重复，即使书名不同，内容重复的也不能买，但又不能遗漏有用的资料。这一要求看似简单，做起来却相当困难，达到这一要求的前提是对所藏图书心中有数。为达此目的，我尽快掌握所内藏书种类和图书的内容，督促自己在短期内多读书，从历史典籍，各家文集，笔记，天文历法，农业，气象，方志到古代戏曲、小说、俗文学等，从传统小学到甲骨、金文、碑刻、陶文、玺印、封泥、古文字、古器物图录及各家论著等等，无所不读。”结果，先生出色地完成了图书采购任务。“现在史语所所有的中青年学者说，当年我挑选的书，对他们的科研工作有用的都有，没用的都没有。”在完成这任务的过程中，先生博览了所内的藏书，锻炼了自己的记忆力，强化了博闻强记的训练，为日后在学术上拓宽研究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时期开始，先生积累了有关各种古书及其版本的十分渊博的知识，成为通古博今的史学家。例如在指导张泽咸时曾说，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今传本有遗漏，其内容可在《史记汇注考证》中找到；又说康熙年间刻本《太平御览》丢失的宋刻本《太平御览》有关条文，光绪年间刻本





《太平御览》又补上了，可以参照阅读。

上学期间我虽受教于先生，但真正和先生接触日渐增多还是从“干校”回京之后。那时深感我们这一代人受教育阶段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急切地渴望补充自己的知识，因此经常向先生讨教。在与先生交谈中，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知识面非常宽，虽然是以研究先秦和两汉史学名冠学术界，但他除熟读儒家经典和相关史书外，还对诸子百家著作、二十四史、古典小说、小学著述、各地风俗札记、甲骨文、金文、碑刻，乃至版本目录学都了如指掌。翻开《张政烺文史论集》的论文目录，便可窥见，他在许多领域都留有名篇佳作：从在北大史学系读书时撰写的《“平陵陈得立事岁”陶考证》《〈封神演义〉的作者》等，到任职于（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的著文《邵王之湍鼎及簠铭考证》《读〈相台书塾刊九经三传沿革例〉》《六书古义》《一枝花话》等，尤其是任教北京大学史学系和服务于历史所的几十年间，发表的论文《汉代铁官徒》《秦汉刑徒考古资料》《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宋江考》《王杖十简补释》《秦律“葆子”释义》《秦律“集人”音义》《卜辞“哀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试释周初青铜铭文中的易卦》《“十二寡妇征西”及其相关问题》（《柳如是别传》下册题记）、《会文山房与韩小窗》《“十又二公”及其相关问题》《利簋释文》《矢王簋盖跋——评王国维〈古诸侯称王说〉》等。从这些例证看，先生在这几个时期的著作确实内容丰富，涉及文史哲三个学科的诸多学问，细分又包括史学（先秦两汉、宋、清）、文学（话本、古典小说、戏曲）、哲学、甲骨

学、金文、简牍、民俗、版本学等众多门类。在如此多的学术领域内驰骋的学者，在老一辈学者中也属凤毛麟角，无怪乎20世纪40年代他自史语所调任北大史学系时，有的学者称他



张政烺与夫人傅学苓讨论学问



为“小王国维”。先生的国学根基，得益于童年时代读私塾，而后又经过中学和大学的科学训练以及在史语所时无书不读的文化知识积淀，所以才能在多个学术领域都有建树。这一点已被他青年时代对知识的执著追求所证实，如有关石鼓文考释的文章自宋代以来，都是硕儒之作，还是青年学子的张政烺就敢于解释石鼓文的古奥文字，他在《猎碣考释初稿》的第一石中征引各种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60余种书注释难懂的古字，其中为考证一个字“遯”引用金文、字书、经书、诸子之书达16种之多。可以说当时他的考证，字字、句句都有充分的资料为依据。教古文字学的老师唐兰看后点头首肯，足见这时的张政烺已掌握了在大学学习的门径，抓住了基本功训练这一关键环节。与此同时的《“平陵陈得立事岁”陶考征》也是细密入微，正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郭沫若看到后发出“尊说确不可易”的赞叹之声。此时的张政烺不仅饱读经书、史学典籍和诸子之书，而且也关注古典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当时在北大讲文学史的胡适不知道《封神演义》的作者是谁，先生只用一天的时间，写出《封神演义》作者是陆长庚的信给胡适。因引文准确、论证清晰，胡氏说“现在有你的考证”，“大概很可信了”。青年时期的张政烺文史知识面的宽广，是他步入学术领域的通衢大道的重要条件。这样注意夯实基本功的学者所走过的道路，是值得后学者珍惜的一份无形的文化资源。张政烺先生在成为学术大家后所写著作的含金量，更是一般喜欢做表面文章的“学人”不可企及的。众人都知《水浒传》和戏剧中的宋江时时都想着对皇帝尽“忠义”，盼招安，而先生从《宋史》相关传记、《东都事略》《宋会要稿》《三朝北盟会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史书和大量当时人笔记中梳理出宋江既没有征过方腊，也没有投降官府，实际上“宋江为人勇悍狂侠，才识过人，为了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猛烈斗争到底”。这篇文章虽不长，但若没有丰富的史学知识和广博的文人笔记常识，是写不出的。先生曾对我说，该文曾得到毛主席好评。又如先生在《会文山房与韩小窗》一文中说：“抗战期间，漂泊西南天地之间，1938年至1940年我住在昆明东北郊龙泉镇宝台山的观音殿，插架图书颇多善本；其中有俗曲两箱……多车王府，百本堂抄本……内中有一些是小窗氏的作品。……我知道有韩小窗子弟书是从这时开始。”这类书与先生所研究的先秦两汉历史相距甚远，但他却把这套书看完。事隔30年后恰遇胡光平的《韩小窗生平及其作品考查记》刊出，先生凭记忆和后来积累的材料著文订正《考查记》，指出韩小窗自名“二凌居士”，必为“大小凌河之间的人”，即是义县的韩小春，说“我找出的韩小春就是胡光平文章所考查的”韩小窗，“这一点是没

问题的”，并指出韩氏是一位通俗文学家，对东北地区文化普及起过好的作用。这个例子说明先生青年时代无书不读，努力充实和扩展自己的知识，故而可以应对自先秦至明清社会史和文化史中的各种难题，发表的意见每每令人叫绝。就连日本相扑一类击技的渊源，先生也烂熟于胸。这里有个小故事，田中角荣访华，要有大相扑在首都表演。相关部门找到先生问中国有无相扑记载，先生给予了满意的答复，指出史书上早有记载，明清小说里不乏其例。这个小故事足以说明先生的文献功底是多么深厚，不愧“活字典”的美称。

二、文献与考古相结合

先生时时关注和掌握相关学科的发展状况及新的研究成果，并把它们吸收到自己的研究领域内，利用考古资料研究历史上的重大课题即是突出的例子。《张政烺文史论集》中，《汉代铁官徒》《秦汉刑徒考古资料》《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卜辞“哀田”及其相关诸问题》等，都是先生利用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表达对中国古代史看法的重要论文。《铁官徒》一文就是这类论文中的第一篇，有关铁官徒的材料，采自当时认为是灵宝出土的刻有刑徒姓名的砖志。砖志记有籍贯的天下各种刑名罪人来此作苦力的文字材料，具有这种身份的人无疑就是官府的炼铁奴隶。此文是先生利用出土文字材料证明社会性质的尝试之篇。继后撰写的《秦汉刑徒考古资料》，既纠正了前文误信刑徒砖出土地在灵宝之说，又坚持不懈地选择有明确出土地的金文和刑徒砖，所载论证秦上党郡、后汉洛阳都城用罪人充当官府苦役的材料，证明秦汉时期官府仍大量使用奴隶劳动。这依据考古所得实证探讨秦汉时期社会状况，揭示秦汉社会真实性质的新途径。先生的《十进制》长篇文章，同样运用这样的研究方法，借鉴恩格斯研究古代希腊和罗马总结的理论，分析甲骨文相关的材料，发现商代晚期存在“十进制氏族”组织，而且文献史料表明西周时的农业生产和军事编制同样具有的十进制特点。这种“氏族组织是社会发展上自然的产物”，金文材料显示出氏族组织有较强的生命力，并以不同的形式演进为内容更为丰富的家族形态组织或递升为宗法组织，它与军事编制相适应，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大特点。这篇论文较早地开辟了利用甲骨文全面研究商代和周代氏族组织发展根源的历史特性的途径，为以后学者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开了先河。文献与文物相结合研究古代社会真实面貌方法已达纯熟程度，利用甲骨文考察商代农业生产状况就是一个





绝好的例证。先生就此发表了《甲骨文“肖”与“肖田”》《卜辞“哀田”及其相关诸问题》《释甲骨文“尊田”及“土田”》和《殷契“耆田”解》等一系列文章。“肖田”指“划除草”，“哀田”为夏至日到冬至日的“开荒”。“尊田”和“土田”，分别“是把开荒的地上作出垄来，使它变成正式的田亩”和“农分田而耕”的“度田”。“耆田”则是一年收成后的“岁终报功之祭”。这是一整套研究农业卜辞得出的农业生产程序和状况的系列论文，20世纪70年代前后，这样完整地观察到商代农业生产过程的学者甚为罕见。尤其是先生在《“哀田”》一文中对农业生产者“众”的论述十分精当，指出他们就是“族众”，生活在家族组织中，在族长的率领下为商王耕种农田或服兵役。这一论证与《十进制》论文相呼应，进一步深化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不仅为全面认识商代晚期农业生产水平提供依据，还为怎样理解社会发展程度打开了多渠道的信息。先生这种继承前人、处处不忘把文献史料和出土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研究秦之早期历史中也得出了不同凡响的创见。他在《“十又二公”及其相关问题》的论文中，主要是从秦公钟、秦公簠的铭文所载“十又二公不坠在上”和“十又二公在帝之坏”，以及1978年出土的秦公钟和钟的铭文立论。尽管先生也主张“十又二公”不包括出子，而作器者为秦景公，约与孔子时代相当。但先生更深入地挖掘“十又二公”蕴含的丰富思想内容，提出“十又二公”是“法天之数”的深刻思想，而《左传》《国语》《史记》《周礼》《礼记》和部分子书都“把十二之数提到理论高度，把它看作自然规律”。这正与“《左传》十又二公本来是法象天之大数”相符。这是当时人真实的哲理思想。这样求解秦公钟铭文中的“十又二公”的文化内涵，不是更符合一个时代的思想趋向吗？先生用地下出土文献证史的研究方向已成为解读先秦两汉历史必由之路，他在负责整理长沙马王堆帛书和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期间，总是把最难解释的问题留给自己，如对《秦律》“集人”和“葆子”的理解，着实令整理者们费解。要想说清楚它们的含义，没有深厚的文献根基是难以办得到的。公布的秦简释文中未注释“葆子”和“集人”的文义，先生深感不安。本着对读者负责和学术发展的需要，先生写出《秦律“葆子”释义》和《秦律“集人”音义》两篇论文。在《“葆子”释义》一文的开篇，他说：“1976年8月整理付印时未解其义，后检《墨子》《三国志》《居延汉简》等书，觉其义犹可说。”《墨子》一文治史的学者很少有将其视作史料书使用，先生却能把书中的《备城门》《号令》《杂守》《备水》等篇中的“葆宫”看成是战时被当做人质居所的现象，同《居延汉简》中那些被收“葆”的人相比较，又与《吴书》的

“保质”相联系，证明“葆子”是从“守护”、“抵押”这类形式产生出来的，一直延续到三国时期。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一论证解决了《秦律》中屡屡出现的“葆子”这个费解的难题。《“集人”音义》则是从古文字构形的演变和古音方面证明秦简中的“集”字就是“樵”字，“集人”就是“樵人”。这两篇论文无人提出异议，已被学术界所公认。先生对秦简研究做出的贡献远不只这两篇论文，这是学界有目共睹的。

三、善破未解难题

由于先生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深厚，又善于吸收和利用考古新发现和新的科研成果，所以他极有创造性地破解了千百年来学术上一些未解之谜。对“卦画”的发现和研究以及王逸牙签和岳珂“刊正九经三传”的考辨，便是几个突出例子。先生分别著文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和《〈王逸集〉牙签考证》《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宋代出土的铜器铭文末尾的奇字，郭沫若认为是“族徽”，唐兰说这类奇字是组成文字的数字“字母”（包括甲骨上见到的此类数字）。先生在整理马王堆帛书《周易》时与历代研究《周易》的书接触较多，故在1978年长春举行的古文字会议上，当与会人员恳切要求张先生就周原甲骨上出现的数字组成的“奇字”发表看法时，先生在讲演中提到：“《周易》中老阴、少阴都是阴，老阳、少阳都是阳，数字虽繁，只是阴、阳二爻，把周原甲骨上的数字变成阴、阳爻，使纷繁的数字简单化了，就易于理解。”这见解得到与会人员的肯定，并希望先生著文发表。先生整理出32组甲骨金文中出现的《周易》材料，从一至八的数字中经常出现的是六和一，并解释二、三、四不出现的原因。这种“初步简化”是把二、三、四“分别向一和六集中，还没有阴爻（--）、阳爻（—）符号”。这篇论文里的一节是“周初筮法拟测”，立足于“考古材料中最大数是八”的事实，全面论证了长春会议上演讲时发表的观点。还设专节探讨夏代的《连山》，得出夏代《连山》、殷代《归藏》和周代《周易》的“主要区别是卦名不同”。该文刊出后，带动了海内外学者研究《周易》起源的热潮，美国吉德炜教授非常敬佩先生这篇论文，说：“这篇文章后来被翻译发表在《古代中国》（Early China）第6期（1980—1981年），当然说明它很重要。”“因为从1969年写博士论文起，我就对这些数字符号大伤脑筋，而您却把它们讲了个水落石出。”（见《揖芬集》）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也在他的英文论著中将先生的《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全文转载，向





世界展示先生的学术成果。先生这篇解决了奇字“千古之谜”的论文，无疑应该在现代学术史上写上一笔。以后先生又发表了《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易辨——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从材料上对前文作了补充和完善。《〈王逸集〉牙签考证》《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是两篇关于版本目录学的论文，充分显示出20世纪30至40年代先生在史语所积累知识的广泛和研究成果的丰硕。历来《后汉书·王逸传》《补后汉书艺文志》等书，对于王逸作“《汉诗》百二十三篇”的记载和理解失实。先生根据“汉王公逸象牙书签”记有“(逸)又作《汉书》一百二十三篇”的考证，证明“《汉诗》百二十三篇”本应为“《汉书》百二十三篇”，“诗”是“书”之讹误。进而先生考证出王逸还参与撰写《汉书》(即《东观汉记》)，从此改写了刘知几把王逸说成是“儒生之腐者”的偏激评论。据此先生又研究我国目录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从文献中找到郑默的《中经簿》和荀勖的《新簿》是两部目录学的肇始之作的根据，证实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目录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突破了“但录题”，“并无解题”的传统观点。此论对目录学史的重新审视起了推动作用，把我国目录学史提前了数百年。《沿革例》是明万历年间重编内阁书日时，未加考证而认定《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为宋岳珂刊本。此后藏家和学者都按此标准论说《沿革例》的刊刻者是岳珂。其实不然，先生根据宋元以来经书各种刻本和数十种文集考察出该书是元初宜兴岳浚刻本，是把宋代廖氏世綵堂刻本重新校正刊刻，并在引语中说明此举，“偏旁必辨，圈点必校，不使有毫厘讹错，视廖氏世綵堂本加详焉。旧有《总例》，存以为证。”分明与岳珂毫不相干。先生又从廖氏开刻《九经》的时间上论证《沿革例》与岳珂无涉，指出“廖莹中开《九经》在景定纪元以后”，上距珂卒已近80年，“是珂已不见其泐书，更无论仿刻之事矣”。先生又论证岳飞南渡后迁居今江西德化，根本没有徙常州(宜兴)之事。居宜兴者为岳浚，他附于相台(即相州，岳飞原籍)郡望有据可查，已是元初之事了，所以《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绝不可能是岳珂所刻。先生对相台本《九经三传》的研究成果改变了几百年来对该书刊刻者的错误判断，对文献学和版本的论断贡献之大，至今无人出其右。一位历史学家、古文字和文献学家，又被公认为版本目录学家，先生当之无愧。由于先生对古代典籍烂熟于胸，对新材料闻多见广，且善于融会贯通，所以才有攻克学术难题的大量佳作贡献于世。先生的治学经验是：“博与精的结合，旧文献与新史料的结合，是新时代治史者成长的最佳途径。”(《我在史语所十年》)先生是这样做的，并且努力实践着自己的